

【沉思默想】

□王佐良

珍爱生命

只有当我们珍爱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体以及这个生物圈所赖以存在的家园，我们才不至于有一天迎来它的噩梦。

生命，迄今为止，在宇宙中还是唯一的。尽管天文学家声称，有很多系外行星被发现，但是，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还没有发现。有的科学家认为，在宇宙中，生命的出现是偶然的。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一个有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近乎完美的星体，太奇妙了，它虽如沧海一粟，却有充足的阳光、变化的四季、辽阔的水域和陆地、丰富的资源以及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地球上有了我们——人类这最高级的智慧生物。有生命的地球也许真的是唯一的，即使人们不断地臆想曾经有外星人造访，但那毕竟只是臆想。

那么，生命在地球上的生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生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在为生存和繁衍而竭尽全力。从微生物到高级灵长类动物，都是如此。春天的花朵姹紫嫣红、千姿百态，却很少有两种花的颜色完全相同，它们的香味更是千差万别，目的都是吸引更多昆虫帮助它们授粉，以结出更饱满的种子。病毒为什么会变异？这是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人类大量使用各种越来越有效的化学药物，压缩它们的生存空间，它们被迫不停地变异，以便入侵更多的生物体，延续它们的生存。适者生存。这一生存竞争的法则促使各种生物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攀援植物在原始森林里不断向高处蔓生，为的是获得阳光，好开花结果、繁衍后代。雨燕在数千米的高空日夜不停地飞行一个多月，为的是在北极寻找一片天敌较少、食物充足的地方孵育宝宝。还有海洋中回游的鱼群，冒着鲸、鲨等食肉动物的围



灰掠鸟

追堵截以及人类超级渔网的围捕，看似毫无希望，却舍生忘死地向产卵地游去，即使只有少数死里逃生，完成产卵、繁育后代的庄严使命。

经历多少亿年的灭绝和重生，生物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在不断变化和人为改造的环境中，养成了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其中很多很多并非我们现有的知识所能理解，成为一个个难解的谜。春天，温暖的马来西亚海边，一种灰掠鸟启程了，飞往新疆北部的草原，在那里光秃秃的岩石上筑巢产卵。它们捕捉蝗虫喂养雏鸟，直到初秋，父母们启程返回马来西亚，却把幼鸟们

留在原地！等到深秋，幼鸟们长大了，它们自己返回父母的故乡！它们何以认识那迢迢几千公里的路程？难道它们的父母在空中为它们设置了路标？这真的是一个谜！类似的谜还有很多，企图解开这些谜团，其实就是要解开生命在几十亿年的漫长进化中所积累的种种奥秘。对于今天的人类，依然任重道远。

人在生物界无疑处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几百万年来，通过进化和自觉的活动，人类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组织，具有了科学思维和创造能力，已经自觉地、有计划、有目的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地质学家们认为，

由于人类的自觉改造活动，从地质年代上，地球47亿年来首次进入了人类世。但是，人类真的是在把地球改造得“适宜”人类生存吗？答案并不乐观。从历史上看，随着人类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带来的却是物种的加速灭绝。这意味着，地球作为生命家园的供养状况正加速恶化。无疑，作为地球生物之一的人类的生存也将恶化。不适宜其他物种生存的环境，难道会适宜人类生存？记得刚刚搬到位于济南燕子山下的新小区居住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因为厨房里一粒糖屑落到地上，就会引来很多蚂蚁，红的、黑的；在公交车站等车时，也看见蚂蚁在杨树上忙忙碌碌，上上下下。可是短短十年，我突然惊讶地发现，要找到一只蚂蚁已经很难了，还有，蝴蝶、蚂蚱、蚯蚓……也悄然消失在视野中。谁能证明，这种悄无声息的变化不会有一天危及我们自己呢？至少，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担忧吗？

毛泽东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倒在想，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维护地球这个生命的家园，保护那些与我们共同生存的生命体，我们何以显出我们的“宝贵”？当我们用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把生物赖以生存的泥土覆盖的时候，当我们把有毒的废水排入江河大海的时候，当我们让烟尘弥漫在空中的时候，我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更多的物种因此而灭绝，因为它们无法抵御这种剧烈的侵害。而它们的灭绝却意味着，地球生物圈，这个仿佛永远物种繁盛、欣欣向荣的生命集合体，正在逐渐残损和衰退……

珍爱生命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但是，如果认为珍爱生命仅仅是珍爱人的生命，那是一种偏见。只有当我们珍爱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体以及这个生物圈所赖以存在的家园，我们才不至于有一天迎来它的噩梦。

(本文为山东大学教授、翻译家)

吃饱了、喝足了、能睡觉，有了这些幸福垫底，心里就踏实了，随之而来的是要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以前盛行一个马斯洛需求五层次论，无非是说，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总想在精神上折腾些事，不折腾就没完。改革初期，人们思想活跃，精神蠢蠢欲动，像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先掀起波澜的是“星星画展”和《今天》杂志，这股文学洪流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下一下涌到地面，成为当时最热闹的景象。曲阜虽然闭塞，对外界

【曲师杂忆】

文学社

□荣剑

的反应还是很敏感，中文系首当其冲，创办文学社可谓开了曲师思想解放的先河。

文学社是由三班汪家明首创，骨干有梁义亭、常光明、郑树平、宋丹群等人，都是文学青年。大旗一扯出来，立即聚拢不少粉丝，其中女粉丝也不少，著名的有李盈、郭玲玲、骆宝臻等。我那时自感文学想象力差，不是写小说的料，也被他们的热情吸引，成为文学社的外围成员。和外地那些文学社团的际遇差不多，曲师文学社一成立，好像就不受官方的待见，以辅导员赵老师为代表的组织对文学社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忧心忡忡。他们可能觉得，为馒头闹事，塞上一碗猪头肉或可立马平息，而要平复思想和精神的冲动就没有什么好招。现在你可以去问赵老师，他当时最头疼的一定就是这个文学社。

文学社要打响，自办刊物不可缺少，即使达不到《今天》那个水平，也要有那个架势。汪家明他们造势的第一步是把自办的刊物贴在办公楼前的橱窗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一时观者如云。我也挤在前面观察，因为我有一篇小文登在上面，我关心它是否能被人注意到。这可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处女作啊，题目是“关于异化概念”。人家写爱情小说，我谈论高深的异化问题，眼界就是不一样。王凯荣后来问我，“啥是异化啊，我看你的文章没明白。”我只好对他通俗地解释一番：“比如老子生儿子，老子是主体，儿子是客体，儿子是老子的对象化，后来儿子不孝，反过来压迫老子，这就是异化。”王凯荣听了这番解释，恍然大悟，说：“你这么写我就明白了，可你那么写我就不明白。”这个批评真是切中要害。我至今还在写一些人家看不明白的文章，这个毛病看来是在文学社那个时候落下的，悲催。

汪家明办刊物真是投入，坐在被窝里，一字一字地刻写，然后找个油印机一印，装订成册。给刊物起了一个名，叫《展曲》，当时好像有好几个刊名备选，什么《杏坛》、《阙里》之类，不知何人拍板，选了个像中学生的名字，有点露怯。后来77级万卫平等出了个诗集，叫《灰墙》，那就比较牛了。虽然写的诗和我的文章一样看不出大白白，但题目先声夺人，能一下把你蒙住。

文学社轰动一时，《展曲》也陆续出了几茬，随着大学生生活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不断展开，文学事业的动静慢慢就小了。在我记忆中，能够像文学那样激动人心的事大概就是跳舞了，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事。

(本文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

【生活直击】

□刘增人

会风的变与不变之间

会议两天，满满的七场学术活动，再加开幕式、闭幕式，从第一天8:20到第二天18:00，竟全部是学术、学术、学术。

不同了，按年龄排序，我已经进入前十，终于混上了一个时段。“主持人”的角色，发言的位置明显地前移了不少。今年三月在南京，我就跃升前三，被许多人恭恭敬敬地称为“前辈学者”，真是听得心惊肉跳啊！

过去参加的会议，不少是各种研究会、年会，人员层次颇为复杂，有各级领导、特邀代表、名誉会长、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各地区推选的代表等等，还往往有人携带批量的研究生赴会学习。参会的人数，动辄数百人。举办方光是安排不同规格的食宿，代购返程的火车、飞机、轮船的票子，收取会务费、住宿费并返回可以报销的单据，组织会后的“文化考察”，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些特殊的代表和非代表，接待的规格，都不那么容易拿捏得分寸恰好。会议日程，一般是大学者大会作报告，中学者大会限时发言，再一般的学者小组里说说，年轻人也就是听听。因为人多，研讨的中心也松散分歧，莫衷一是。各人自说自话，说完拉倒。对于自己并无兴趣的话题，不少人选择逃会来表示异

议。主席台满满而听众席上寥寥的尴尬，并不是个例。

这次去南京参会，毕竟是江南啊，南京的街区，望中是一片乱红浅草景象。更令人新奇的，则是会议的安排。晚饭后恰好路遇匆匆赶来的刚刚升任南京师大副校长的朱晓进教授，我马上拉住他“讨债”：做了大官，不请老朋友吃饭，这合适吗？没想到他竟然未置可否，笑笑就走开了。当时我没有细想，后来颇觉得人情淡薄，偶聚小酌，有那么为难吗？我开始有点感慨起人心不古来了。但回到宿舍，看清楚会议日程，就马上感觉错怪了朋友。日程上明确注明：所有的饭，都是自助餐，没有一次宴请！自助餐上，也不备酒水。会议两天，满满的七场学术活动，再加开幕式、闭幕式，从第一天8:20到第二天18:00，竟全部是学术、学术、学术。而且，会后竟没有安排惯常的“文化考察”。“会议须知”明确规定：“会议不组织旅游，会后想要在南京游览的专家请自行与旅行社联系，会务组也可代为联系旅行社。”耳目一新啊！会风不变，或许正是时代的缩影，昭示着人心的向背！

会上，见到的大多是交往

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朋友，但也不乏慕名已久的学者。前者，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有的还是在读的研究生，有的不过是助教、助研，而今，却大都是学科带头人，光鲜的头衔一大堆，身后的研究生也一大群。不过年龄也都在六十上下矣，有的头发已经提前下岗，倒影显出智慧在闪闪发光；后者，虽然过去没有见过，但与想象中的满腹经纶、见解独到，遇到关乎国家民族的事情，立场毫不含糊，态度决不暧昧，仿佛也并不二致。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如此偏远的海隅山陬默默做的一点小事小情，他们却一清二楚，如数家珍。我们自己人并不太看重的一些过往的“贡献”，他们却屡屡称道不已——这怎不让人感到人心依然是公平的，友情依然是真诚的！

我的年龄在变，会议风气与学术追求在变，而友情不变；人事安排在变，物价在变，而良知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我好像依稀触摸到共和国跳动的脉搏，感受着时代风雨在迅疾地掠过上空。

(本文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